

远去的煤油灯

■文/刘万里

都是黑黑的煤油黑烟灰,那时日子虽苦,但感觉很幸福。

我依然记得读小学时,冬天在煤油灯下做作业的情景。一张小饭桌朝地炉子上一放,煤油灯朝桌子上一摆,我就在灯下写作业,母亲在一旁纳着鞋底,奶奶时不时还要给我们讲故事……在平时,煤油灯灯芯总是拨得很短,可在我们写作业时母亲却拨得很长很长,家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灯火通明”。一到腊月准备年货,煤油是不可少的必需品,按照习俗,除夕到元宵,每天夜里都要点亮煤油灯。赶集时我常常跟在母亲后面提着空煤油壶去镇上买煤油。煤油供不应求,去晚了就买不到了,每次母亲看着装满的煤油,脸上就露出一丝微笑。

我在小学读书时,放学后常去舅舅家吃饭,舅舅家有一盏马灯,这是玻璃制作的灯,带玻璃罩,这种灯可以调灯光大小,还可以挂在屋顶的钩子上,就像现在客厅里的吊灯。我一直想拥有这样的灯。

后来,我央求母亲给我买一个玻璃灯,母亲就在镇上买了一个带玻璃罩的玻璃灯。玻璃灯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光调大调小的旋钮。有了玻璃灯,晚上在灯下写作业,感觉很美。学校离家有五六里,中午我们一般不回家吃饭,所以每天天还没亮,鸡叫第三遍时,母亲就点燃煤油灯给我们做早饭和准备干粮,我和妹妹在煤油灯下吃完早饭,然后背着书包去学校。

直到我上初中,教室里才有了电灯,那时只有镇上才有电,用的都是柴油机发电,每天晚上8点到11点供电。那时电不稳定,停电也很频繁,教室停电后,同学们每个课桌上都会点亮一盏煤油灯,大家在煤油灯下挑灯夜读,做着白天还没完成的试题,背记着政治、英语。在摇曳微红的灯光下,一片寂静,没有人注意到教室里刺鼻的煤油味,也没有人注意到教室的上空飘荡着的阵阵黑烟,每个同学都在敲着劲学习。那时,来自农家的孩

子们心里清楚,只有考学才有光明的前途。那时,我还迷上了文学,常常在煤油灯下学习文学理论或熬夜写作,那时我就坚信,只要努力,梦想就会变成现实。第二天早上醒来,母亲就会指着我黑乎乎的鼻孔,让我不要熬夜。

后来我到县城上高中,教室宿舍都有电灯,感觉好幸福。后来,我家搬到县城附近,家里终于用上了电,终于告别了煤油灯。

如今,煤油灯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但是煤油灯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温馨可亲,是它照亮了我童年的梦想,是它指明了我年少时的奋进方向。不得不让我感叹,煤油灯虽已隐退,但它却温暖了一个时代。它不仅温暖了许多人的记忆,也见证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

那忽明忽暗跳跃的灯火,不仅点亮了几代人的生活,也点亮了一段沧桑的岁月。活着,就要珍惜生活。

一生的大遗憾

■文/胡传浩

小时候,我迷上了书,晚上看书,是需要点煤油灯的,有的书虽然看了好多遍,但仍然看得津津有味。那时,我竟然把我们村子里能找到的书籍都看了一遍。第二天早晨起来,鼻孔里布满了煤油黑烟灰尘,用手指一挖鼻孔,手指上

候碰上了一场不堪回首的运动。小学毕不了业,初中招不了生。整群学生都在学校瞎混。当时有一位陈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悄悄地对我说,你们正是读书的年龄,不要听读书无用的瞎说。不是读书无用,是不读书肯定无用。说着,他拉开蚊帐,露出两排藏在床背后的紫竹书架,上面排列着满满的书籍。他要我一次借一本,看一本换一本。就这样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吧,在陈老师的帮助下,我读了好多好书。

记得从他那里借来的书,重要的地方都有评句,有的地方还打着感叹号和问号。参加工作后,我的一些文字材料屡屡获领导点赞,以至于大半辈子的工作是与文为伍,应该是得益于陈老师对我的孜孜教诲,得益于那满满的两架子书的

熏陶。

但真正让我萌生教师念想的,则是与夏老师的交往。

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吧,我有幸参加到萧山中学迁建项目的筹建工作。在那里我遇见了当时萧山中学的副校长夏老师。他是学校迁建项目的成员。既是长者,又是学者。一口厚重的苏北家乡方言,更显露他的平易近人与和蔼可亲。迁建项目做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去广东考察。那次在广州白云机场下来,已是夜深,夏老师的一位学生驾车在机场迎接我们。见面后一个大大的拥抱,感动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那个对老师的感恩之心、那个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师生之道,难以言表。这位从萧山中学出去的学子,当时已经在广东省级机关工作。由于

太太烧的茶叶蛋

■文/廖怡沁

起来了,太太烧茶叶蛋多半是下午,村里会在下午生火的人家没有几户,独一无二的炊烟伴随着桂枝的飘香,成为了记忆里最寥远的画面。

我在很多地方都吃过茶叶蛋,街边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的,学校食堂摆在橱窗里卖的,还有星级酒店提供的早饭里的,大多都不入味。“那是烧得不对。”太太说。

太太的茶叶蛋格外入味。等到蛋熟了,太太就把它们一个个从水里捞出来,放在土灶边缘引水的沟里。

蛋很烫,我拿不住。但太太会拿着那些蛋,一个一个挨个在灶沿上敲碎,她好像摸不到那近达百度的温度,每捏起一个蛋,都像对待孩子一样,仔仔细细地敲碎了,她说这样蛋才好吃。现在的人大多没这个耐心,大时代背景下的犬儒主义配合着精致的利己主义,把这些残余的美好消耗殆

尽,这样的茶叶蛋已经吃不到了。

等鸡蛋一个一个都敲好了,太太会再一个一个把它们码进锅里,重新加水,加酱油,这时候她总是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进里屋,拿一个绿色的圆罐子,颤巍巍地打开,倒上茶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开始手抖了。她总说没事,然后转身又颤巍巍地从壁橱里拿一只搪瓷大碗。

不消一会儿,蛋就好了,在锅边等着的我早就迫不及待了,蛋一出锅,就伸手去抓,哪怕被烫着也甘之如飴。

没吃完的蛋,总是被放在碗里,用保鲜膜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起来,让我带回家去,那口齿间的馨香,亦能留几日不散。

仔细想来,的确是好几年没吃到了。

她的确是老了。国庆回去的时候她还精神矍铄。

过了两个礼拜再回家见她的时候,已然风烛。

躺在床上的她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身侧的手还是依旧颤抖。

记忆中,太太还是那个坐在树下念经的小老太太,她给我讲过抗日战争时躲鬼子的经历,“脸上都要涂上灰,躲在稻草堆后面。”她拄着拐杖敲地说,“现在日子好了,要珍惜”的场面还依稀留在眼前;她教过我纸元宝怎么折,手指翻飞间一张铝箔纸就变成了圆滚滚的银元宝,但我总是怎么也学不会,我手里歪歪扭扭的元宝到了太太手里,立马就带上了生气,像新年里贴在门上的胖娃娃一样顽皮;她儿时常教我念上那么一段佛经,佛经的具体内容早就忘记了,只是线装书上的簪花小楷带着的是岁月的味道。相知至今犹可忆,旧游何处不堪说。

九泉感泪声,上寿归天家。奈何饮汤过,明日许重逢。

外公的“杞人忧天”

■文/傅利达

还要替他背书包。

70年前,俺老爸小学三年级随父从南京去上海生活,他一人独自在新家附近找能接受其借读的小学,并自己办妥了一切手续。现在是三年级学生可能穿衣还得家长帮忙。

47年前,俺自己13岁时,独自混入大企业组织的职工横渡钱塘江活动,横渡回家,父母也没啥大惊小怪,只当是早上放出的小羊,晚上回了家。现在是13岁孩子参加个学校演出,还需老妈全程陪同,拿衣擦汗,递水化妆,搞得像明星必配助理那样。

16年前,俺女儿13岁时,记得基本上也都是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现在的中小学校门口,只要是上下学时间,必定是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占领,路面定是挤满了接送孩子的小汽车电动自行车。

现在,俺外孙女才17个月,如果教育之现状仍未改变,那她13岁

时,估计也只能同上面图片中那女孩一样,大大的书包,淡漠的表情。现在照片上,外孙女那乐已又乐人的“快乐之笑”,也只能成为历史的记忆。这也是我这“新外公”真切的担忧。同时也在思考,是让她也无奈地加入“负重童子军”呢,还是支持她爹妈设法将她送去自由快乐的“国际学校”,这也成了俺莫大的顾虑。

实际上,让孩子“快乐成长”也是每个时代都会谈及的话题。鲁迅在《风筝》中也认识到“玩”是儿童的天性,后悔在弟弟小时候,不让他玩风筝。现在的家长,似乎都有一种“无奈的贱”,对孩子的期望过于功利,或宠或溺,事事包办,小题大作;家教报班,孩子累晕。学校又很了解“家长心理”,顺风推舟,一唱一和。

希望教育的春天早日到来。希望教育之“有病”尽早治愈。希望我这“新外公”真的只是“杞人忧天”。



人性的试金石

■文/胡艳丽

新近出版的《四世同堂》,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也包括由英文版译本转译回来的后13段,校正了一些错误,原出版的作品因被删节而变形、逻辑混乱的地方,在这套全本中得到了较好的复原。

《四世同堂》故事情节,很多人耳熟能详。它发生在抗战北平沦陷时期,北平小羊圈胡同里祁家大院的祁老人渴望圆满过80大寿,四世同堂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功,然而日本人突然打进来,祁老人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也随着温厚老实的祁家第二代天佑的受辱而死戛然而止。祁家四代人的命运终因各人的选择不同而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祁老人有对日本的愤恨,却始终没走出保卫小家、保卫四世同堂的小民意识;谦和有礼、不与人争的天佑即使想做不招惹是非的商人,也终是难逃厄运。祁家第三代的选择,最是发人深省,一个藤上结出的是三颗完全不同的瓜:老大传承了父亲的温厚,在报国与尽孝之间摇摆不定,经受着精神的痛苦;老二见风使舵,为权与钱不择手段,最终被日本人打死;老三是坚定的革命主义者,是抗日的英雄。最令人接受不了的是,祁家第四代小妞妞的死亡,如花骨朵一般的小女孩儿,因拒吃“共和面”而饿死在祁家人知道日本投降的当天。

小小一个祁家院,相同的家风、相同的教育,却养育出不同的青年。祁家如同一面镜子,映射了小羊圈胡同的人们在日本侵略下的全貌,而小羊圈胡同里人们的生死命运和个人选择,也映射了北平,乃至一个时代国人的选择。可喜的是,不论在非常时代上演了多少丑恶,那些善良、勇敢、坚定的人们,终是用自己的英勇抗战,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作者在书中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不仅因为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因他们在我们生活中总能找到投影。比如汉奸冠晓荷,手段不高却贪心不小;她的女儿招弟,在父母的不断调教下,逐渐堕落,卖弄女色,当母亲这棵“大树”轰然倒塌,自己便上了“前线”,成了一名美艳的特务。祁家二少爷、冠晓阳之流也凭借“长袖善舞”的本事,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

苦难是检验人性的试金石,它可以唤起人性中勇敢与正义的力量,也可以释放出人丑恶的兽性的一面,见证人的懦弱与勇气。《四世同堂》里的人物,在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并没有全部苏醒,一些人依然不知灾难从何而来,更不知未来的出路。半是混沌、半是光明,老舍留下了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然而站在时光之外,我们思考更多的应是,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当时做出选择的深层原因,因为人性中的恶从未离我们远去。

量米的记忆

■文/孙伟林

家里的整体橱柜下面,放入了一个嵌入式米箱,每次做饭的时候,根据吃饭人数的多少,可以选择不同的按钮,于是,米箱里的米就哗啦啦地流到下面的抽屉里。此情此景,让我想起童年的时候,去镇上粮站量米的经历。

量米,也就是买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买米是需要粮票的,而且每个省份每个地区甚至是每个县都有自己专用的粮票。最牛的是全国粮票,顾名思义,它可以在全国使用,对于一些要外出的人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你买个包子买根油条都需要粮票,如果没有粮票,是要多花上一些钱的。我的大姨跳出农门嫁到了上海,每次回来,都会带给家乡人一些全国粮票,那是我们非常期盼的事情。

有了粮票,才能去量米。粮站买米的窗口,非常高,几乎超过童年个子略显的我。当我把准备好的粮票和钞票递给里面那个高高在上的粮站工作人员的时候,我明显可以感到他的趾高气扬和对我的鄙视。趾高气扬是因为他吃的是真正的皇粮,鄙视的是因为每次我去量米,那个数字总是少得有点夸张,是五斤,也会有十斤的。只见他扳动手中的档阀,称好了分量,叫一声:接牢。我便拿着早已经准备好的小袋子接在出米口。刷一下子,米就没有了,不像别人家,可以听到哗啦啦的声音。然后里面的会扳动另外一个档阀,啪嗒啪嗒这样敲两下,留在米道里的米粒就会乖乖地滑下来。我常常希望他可以多敲几下,这样就会有多几粒米下来。有一次也怯生生地和里面的人说:叔叔,能不能再敲几下啊,好像还有米的呢!里面的不耐烦地抢白我:你以为五斤米有多少啊!喏,再给你敲,给你敲。咚咚咚,几声特别刺耳的很不情愿的声音过去,又有十几粒米粒落进了我的小布袋里。

拎着米,我回家了。家里,干了农活回来的母亲已经准备了萝卜,晚上吃的是我们最不想吃的萝卜粥,因为吃的时候肚子涨的要死,可是一会儿就会感觉饿。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加点萝卜或者红薯,总比光稀饭要好一点。如果做干的饭,五斤米,还做不了三两顿饭!

人的一辈子总会有许许多多的遗憾,应该说那都是些小遗憾,烦恼一阵子就如过眼烟云。真正的遗憾,也就是大遗憾,多在人到暮年,或者是退休以后,当自己对自己人生作初步盘点,简要小结的时候才知晓。

我的大遗憾是此生没能从事教师职业。

成长于上世纪50年代农村的我,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能够就读于一所完小。完小的校舍是一座设在萧山沙地平原上的庙宇,叫永兴庙。记忆中有前后两幢建筑,前殿是教室,后殿是办公室和教师宿舍。教师极大部分是诸暨籍的,也有几位绍兴籍。他们吃住住在学校,全身心投入教学,教育质量非常不错,在当地很有声望。可惜的是,我们这一届小学毕业的时

慵懒的阳光敲碎了清晨的宁静,怅然若失,就像慕容雪村所写,走着走着就散了,风吹过云就散了。

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在村头翘首等我的老人就这样走了。她如同村头那棵镌刻着岁月痕迹的桂树,给我的味道很特别,总能让我的思绪蓦然涌进一阵潮流。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碗茶叶蛋。

“烧茶叶蛋啊,最重要的是挑蛋,要用家养鸡生的青壳鸡蛋,那种鸡蛋营养好,味道也好。”农家的大铁锅,里面满满地倒上一锅水,太太总会小心翼翼地把鸡蛋一个一个码整齐,再盖上锅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到灶前,用一把稻草引着火,塞进灶膛,火光照在她脸上明晃晃的,明火的温馨,在农家土灶的掩映下愈发悠长。这份悠长的美好,直至今日都挥之不去。

火生起来了,炊烟就袅袅地飘

做了几百天的外公,天伦之乐挺享受。

可近日,俺这新外公忽然有点忧郁起来。起因是,连着看了如下三张照片:

第一张,是我快一岁半的外孙女鲁若水,笑得好开心,无忧无虑,天真烂漫。

第二、三张:网络图片,是如今小学生的真实写照。看,比那小女孩单薄身体厚二倍的沉重书包,忧郁的表情令人心酸;肩背手提的小男孩,一个书包二个拎包,提着琴盒,估计兴趣班也不会少报。

真不希望俺如此快乐的外孙女,几年后,也要加入这“负重童子军”。

周围有不少在读幼、小、初孩子的年轻父母。经常听到他们对现今学生负担过重的无奈陈述,看到他们在群里宣泄对现今学校教育的怨气。